

詞典研究丛刊

8

四川辞书出版社

詞典研究丛刊

8

词典研究丛刊编辑部编

四川辞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杨宗义
版面设计：陈秀娟

词典研究丛刊（8）

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邛县红光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50 字数138千
1987年5月第一版 198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统一书号：9458·20 定价：1.35元

标准书号：ISBN7—80543—019—5/H·11

文字古书孳乳相生
椎意寓势形义分明

《汉语大字典》古今淹考

百怪横流 乃是书太版

致望 陆宗达 一九八四年四月

编者按：这是中国训诂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汉语大字典》学术顾问陆宗达先生为《汉语大字典》第一卷正式出版发行的题词。

目 录

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徐中舒	(1)
我的喜和忧	李格非	(3)
字典杂议	赵振铎	(5)
十年回顾	冉友侨	(12)
喜看遗愿化宏图	朱祖延	(16)
《汉语大字典》的释义	李运益	(21)
述者之谓明	晏炎吾	(30)
《汉语大字典》的词性标注	邵世强	(34)
《汉语大字典》通假义项说略	伍宗文	(42)
略谈我国的辞书结构	石家金	(61)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使动义项	徐祖友	(66)
义值和词典编纂工程	张世挺	(72)
编纂札记(之二)	祝注先	(125)
“桃印”志疑	崔恒升	(137)
词义札记二则	罗宪华	(139)
“不齿”与“不足挂齿”	张斯忠	(144)
《辞源》单音节词条义项错漏举隅	林伦伦	(146)
评《现代汉语逆序词目》	甘于恩	(150)
转注研究的研究	汪耀楠	(153)
段玉裁与《诗经》研究	向 烹	(169)
新中国出土简帛书释文总录	陆锡兴	(182)
来函摘登(71)	本社新书预告(124)	稿约(145)

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汉语大字典》主编 徐中舒
四川大学教授

经过十年艰苦奋战，由湖北、四川两省同志协同编纂的《汉语大字典》第一卷终于问世了，其余各卷也将陆续呈献给读者。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

《汉语大字典》是一部偏重提高的大型语文工具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为对象，帮助他们解决在阅读和研究古今著作中遇到的汉字形、音、义方面的问题。它是古今楷书汉字单字的大汇编，大约收楷书单字五万六千左右。要求尽可能历史地、正确地反映汉字形、音、义的发展。在字形方面，它是对古今汉字的初步整理。在楷书单字条目下收列能够反映汉字形体演变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等形体，并简要地说明其结构和演变。在字音方面，它要对所收的几万个楷书单字标注现代读音，并根据可能反映出中古和上古的字音情况。在字义方面，力求义项完备，释义准确，努力反映字义的源流演变。

对于《汉语大字典》这样一部大型语文工具书，海内外人士早已瞩目。大家知道，近年台湾省出版的《中文大辞典》收汉语单字近五万，是一部规模宏大的汉语文辞典。相比之下，《汉语大字典》就汉字单字方面而言，在形、音、义方面都超过了这部辞典。我们不妨将这两部大型语文工具书的字形解说部份比较一

下。《中文大辞典》在楷书单字条目下收列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行楷、草书等形体，并在义项后词条前设有“解字”栏，对汉字的形体结构作了一些分析。但是，它所收列的字形，都是取自二三手资料的字形书，失误颇多，甚至有臆造之处。它的“解字”，只引用了《说文解字》和《说文诂林》中有关的材料对小篆形体进行解说，而没有吸取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这就无法做到该辞典要求的“每字之下，首列本义”。并且，在这部辞典里还有些字连古文字形体也未列出，有的字应该解形而没有解形。和《中文大辞典》不一样，《汉语大字典》字形资料的选取，基本上来自原拓本或原件照片，其中很多是采自解放后新出土的文物，对古文字形体的结构和演变的解说，尽量地采用了目前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从而对《说文解字》进行了补充和订正。一个时代应该比一个时代进步，现代的字典应该反映现代最新的学术成就。《汉语大字典》就是要力求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水平。编纂这样大型的字典，在我国确实是开拓性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汉语大字典》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全国一些单位和个人的大力协助，我在这里谨向有关单位和有关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诚恳地希望海内外各方面专家和广大读者对这部字典多多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修订，不断提高质量，使之更好地为我们祖国的四化的建设服务。

我的喜和忧

《汉语大字典》常务副主编 李格非
武汉大学教授

《汉语大字典》第一卷出版了，这是大喜事。但对我来说，是“一喜又遇一忧”。喜的是工作有了初步成果，我们由无到有，有了自编的一部大字书，还没有完全辜负中央到地方、学校各级领导以及全国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对我们的关怀、支持和希望；忧心的是这项任务太大，要求很高，担子过重，实怕我们的编写水平不能达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确实，有四千来年历史的汉字，其形、音、义诸方面的发展内部规律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千丝万缕的瓜葛联系，是异常复杂的。以我们的水平、人力和条件，想要把这部大字典编得比较理想，是很困难的。但我们从来是忧心而不丧志，总是兢兢业业，知难而进，冥冥惜惜地奋战了十余个春秋。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学习。学习古代文化遗产的精华，学习近现代专家、学术顾问的专业理论，学习海内外字、词书的理论体系和先进经验。在内部，川鄂两省同志总是团结一心，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总之，是从大字典的需要出发，尽力之所及，学习新的知识，为我所用。我们所编的字典，虽然自有一些特点和这样那样的创获，我们老师的文章，对此也都各有阐述，但某些新的探索，起于跬步，每每又会引出一些新的问题。总望海内外专家、读者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让我

们的字典得以广收教益，陆续补正，逐步有所提高。本人敬赋散曲一首，以表述我亦喜亦忧的情怀。

增字锦堂月曲

向《汉语大字典》工作同志的愚公精神学习

古籀重刊，飞花错简，传中华光辉文献。惟孳乳以多，既丰富又嫌繁。《汉语大字典》完编，想理清源流正变，艰难，艰难！秀才班，十载铅椠鱼虫，一片寒飀，埋头修纂。形体异迁，音义发展，纷丝缕缕纠缠。酌古沿今谨规范，死字争绎活语言。风雨迷津，感谢党殷勤指点。不为利锁名牵，不省疾疢淹缠，编摩惛惛，呕出心肝一片丹。当此杀青时刻，恨不得乞鲁戈强挽斜阳。待从头，梳爬精勘，消灭矢亥，恭敬敬，向全国人民呈卷。

字典杂议

《汉语大字典》常务副主编
四川大学教授 赵振铎

—

字典是我国辞书的一种类型。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里，用几十个字母排列组合来记录自己的语言，他们的辞书没有必要分字典和词典。但是就汉语来说，记录它的是种形意体系的文字，每个方块汉字有形、有音、有义。汉字数目众多，估计已经超出六万。因此，编写字典来收录汉字就非常必要。

早在先秦时期，识字教育就是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周礼》的记载，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识字就是小学的一门重要课目。汉朝的制度规定，不能认识一定数量的字是不能作官的。古书里面的记载，认错了字，写错了字丢官受罚的事例还是个别的。帮助识字的童蒙课本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

东汉许慎的《说文》，它的全称是《说文解字》，是现存最早的字典。它在收字、解形、注音、释义各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从此以后出现了不少字典。《字林》、《玉篇》、《龙龛手鉴》、《类篇》、《四声篇海》、《字汇》、《正字通》，它们的名称不是“字典”，但是都是字典范围的辞书。清朝初年《康熙字典》问世，字典的名称才确定下来。本世纪初又出现了《中华大字典》。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我国出现了不少字典。这些字典虽然有它陈陈相因保守的一面，但是每种字典的出现也总会给字典领域带来某些新的东西。今天编写字典应该很好地继承这个传统。

《康熙字典》到今天已经二百多年，《中华大字典》到今天也过了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里，我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白话文已经代替文言文成为规范的文学语言。新的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旧的字典已经不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编纂新的字典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大型字典《汉语大字典》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编写的。

二

字典的编写，首先面临的是收字问题。根据字典任务的不同，收字的情况也各异。一部小字典，收字不过几千。中型的字典收字可以上万，而大型字典的收字数目就要多得多。

从《说文》以来，字典的编写，收字都有增加。《康熙字典》的收字已经大大超过了四万。字典收字多，反映了使用文字的增加。但是字典收字是比较保守的，它不可能把当时已有的文字收罗无遗。《康熙字典》收字四万多数量够大的了。它除了《字汇》、《正字通》外，还从《改併五音类聚四声篇海》、《篇海类编》、《字汇补》以及传世典籍里收录了一些字，就是这样，它也不可能把汉字收罗无遗。如《廿四史》的《晋书》已下的史书，六朝以前的子书、一些著名文集，这些著作里面也偶尔会发现有的字在《康熙字典》里查不到。台风的“台”，原来写作“颱”，这个字在清朝初年的文献里不只一次出现过，在《康熙字典》里就查不到。日本人诸桥辙次主编的《大汉和辞典》，台湾省出版的《中文大辞典》收字总数都没有超过五万。《汉语大字典》收字五万六千多，大大地超过现有字典，是当今世界上收字最多的字

『典了。

大型字典的收字，一方面要继承前代字典的传统。凡是见于字典而又信而有征的字应该尽量收录。另一方面要注意从历代文献中收录字典不载的字。

国家公布的简化字，按照《简化字表》收录，不宜任意类推。这样比较有一个客观标准，便于掌握。

民间流行的方言字的收录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不收方言字不妥，因为有些方言字已经很有影响。《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中小型辞书都已收到的方言字，大型字典理所当然的应该收。但是滥收方言字也会使字典失去典范性。大型字典收录方言字可以控制在下面这个范围。即：正式出版的方言词典中收录而且流行比较广泛的字，古今文献里面使用的流通范围比较广的。

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正字原则。不合这个原则的就被认为是俗字，甚至指斥为“讹字”。殊不知这些俗字或“讹字”，有的却很有生命力，经过多年的使用，约定俗成，积非成是，今天已经不能再把它看成讹字了。对待前代字典里的讹字要慎重。字典里指出某一形体是某字之讹，这是我国字典编写实践中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因为确有讹字存在。但是不能够从“六书”的原则去随便确定讹字，要注意到语言文字的社会性，象《正字通》那样确定讹字是不足取的。

要把异体字和笔形微异的字区别开。异体字可以收录入典，而由于书写或印刷关系造成的笔形上的差异，比方侧点可以写成撇点、竖点、横点、斜方点、长方点等等，那是笔形问题，应该统一。

三

现在通行的汉字是楷体，字典的编写除了专门的字典（比

方：甲骨文字典、金文字典、隶书字典）外，一般都以楷体作为收录描写的对象。汉字发展到今天，字体经过了多次变化。加上字的孽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汉字体系。字典有必要分析汉字的结构，说明它的源流演变。《说文》对小篆的形体进行过有成效的分析，这个传统应该很好的继承。

日本的《大汉和辞典》在楷书字头下注意收录《说文》的小篆形体，比较谨严。台湾的《中文大辞典》在楷书字头下收列古文字形体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到行书、草书，收得滥了一些，而且屡转抄袭，有把一个字写成两个字的，有把两个字写成一个字的，还有把字形写倒了的，更严重的是所引的古文字缺乏实物依据。至于字形解说则停留在《说文解字诂林》的水平，对新的成果很少反映。

大型字典在解形方面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在有古文字形体的单字下收列有代表性的、有助于讲明其造字本源和演变的古文字形体。二是凡有古文形体的单字都要有字形解说，说明其结构和源流演变。

古文字形体的收列一定要注意材料翔实，千万不要使用转手材料。对于古陶、古器、货币、玉石书刻和秦汉金文、砖瓦、玺印等文字，更要慎于抉择，从严选用。

字形结构和源流演变的解说，《说文》无疑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可以这样说，《说文》是解读古文字的桥梁，脱离《说文》侈谈古文字的形体结构，有时虽说新颖可喜，但是却不能得其要领。当然，许慎是东汉时期的人，他的解字从小篆出发，有时和殷周古文很有距离，因此，有必要吸收近年古文字研究的成果来补充《说文》的不足，纠正《说文》的讹误。

对于那些尚无定论的说法，对于还有争议的说法，作为一部字典的字形解说可以不必繁征博引。不妨只引《说文》以备一说。

总之，字形解说虽然《说文》就开始了，到了本世纪有很大的进展。由于古文字学还在发展，吸收成果应该慎重，力求做到平实近人。

四

字典注音起于《说文》。《说文》形声字的“从某某声”就表示这个字从某得声，它有表音的作用。至于读若，更是表示字音了。

反切发明以后，注音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进。《字林》、《玉篇》、《类篇》都是用反切注音的。由于语言的发展变化，有些反切到后来失去了表音的作用。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康熙字典》除了采用前代韵书的反切外，还在反切之后标了直音，这给查阅字典的人带来了很大方便。

汉语拼音方案推行有年，使汉字注音工作有了更大的进步。

字典的注音应该吸收这些成果。大字典提出有重点地、适当地反映汉字字音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的注音原则，无疑是正确的。根据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成果，可以采用三段注音法。即：现代汉语用汉语拼音方案注出普通话的读音，中古汉语注出反切，并标上音韵地位。上古汉语主要注出韵部。因为上古汉语的声类和声调的研究还有不少争议，而韵部的研究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公认的结论。

字音标出上古韵部，使字典的结构更加协调。因为一部字典在字形方面从甲骨文、金文开始收录，字义的收列也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它们都追溯到上古时期。如果字音仅从中古反切开始，总感觉有所欠缺。而注音标出上古韵部，使字的形音义都从上古收列也就显得均称了。

字音标注从上古开始，《康熙字典》实际已经作了。《康熙

字典》在有些字下收录吴棫等人提出的“叶韵”材料，实际上已开其端倪。限于当时的学术水平，它没有概括出韵部罢了。

五

一部辞书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释义。

字典以字为收列单位。它和词典的分词列义有所不同。由于文字有假借，词义有引申。一个字头下收列的义项比词典一个词下收列的义项要多。这是可所理解的。

什么是义项？尽管各人的说法不同，迄今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一致的意见。但是从事辞书编写的人凭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作出的概括还是比较一致的。

字典建立的义项和词典建立的义项大体一致。传统的辞书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值得很好吸取。词义具有概括性，建立义项不能脱离概括性。因此一个字或词下面的义项不可能很多。如果某一个字，传统的字书只有几个、十几个义项，而一部新编的字典却立了几十个义项，那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违反了常情，哪有一个字会凭空添加出一倍以上“新”发现的义项呢？

近几十年新词新义的发掘、俗语词的探求取得了很多的成绩。许多从前认为难懂的古书词句找到了比较合理的解释。这是新的研究成果，应该考虑吸收进字典。不过在吸收这些成果的时候要注意词义的概括性，去掉那些随文释义的成分，把新立的意义放到这个字总的意义系统中去考察。

通假义项的确立是汉语字典所特有的。这是根据汉字在使用中出现同音替代现象而确立的。通假义项的建立应该严格从语言事实出发，慎重吸收前人成果。对那些文义本自贯通，并不诘屈为病的现象，不能够视作通假，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所列的通

假要特别慎重，不宜照搬照抄。

大型字典的义项要求要完备。不仅是有用例的义项要注意收录，对于仅见于前代辞书而未发现用例的也不宜轻易放过。因为近年考古发现和俗语词的研究表明，有些仅见于辞书的义项还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当然，有些无用例的义项的出现是由于文字的讹误，前人多有论证，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释义之后、例句之前引用前代辞书材料，在例句之后根据需要酌量引用旧注，说明所建立的义项信而有征，并非向壁虚造。字典里反映出某个义项什么时候收进辞书或见诸旧注，不仅有实用意义，对于从事科学的研究的人来说也大有好处。当然，繁征博引编成《新经籍纂洁》也是不好的。

六

一部字典编成并不简单，哪怕编写细则定得再细，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其间总有不少罅漏，特别是前后照应，要说一点问题没有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字典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照应。不论收字、解形、注音、释义等，无一不涉及照应问题，而照应问题又往往关系到各方面的关系和联系。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宀”部有一大批字都解释为“安”。旧字典这样作是可以的。但这个“安”在现代汉语里情况就复杂了。要用现代汉语来表达，作到释义准确，注意这些字的共同方面和有区别的方面，就是煞费苦心的。

又如异体字的处理、通假字的解释，插图的使用，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不下工夫是很难作好的。

因此，字典编成并不就是工作的终结，它只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雏型。真正的大量的工作还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组织力量进行修订。没有多次修订，是无法使一部字典定型的。

十年回顾

《汉语大字典》副主编 冉友侨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汉语大字典》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是敬爱的周总理1975年在病中批准，由湖北、四川两省组织编写的。时隔十载，经受了不少风风雨雨，度过了漫长的日日夜夜，终于完成了任务，第一卷已经出版。我和很多同志一样，是读满了“十年一贯制”的，清夜回顾，不能无感，兹谈其荦荦大者。

一、特殊的岁月 1975年正处在动乱已极的岁月，“左”的错误如黑云压城，令人窒息，字典编写工作，又刻不容缓。什么“评法批儒”呀，什么“字字句句见阶级斗争”呀，什么“例证要体现无产阶级专政”呀，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呀，等等。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字书，摒弃了长期封建社会所积累的丰富文献，而历代贫下中农可惜又无学文化的机会，更不可能给我们留下文字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实在编不下去。虽然我们也对“左”的错误作了一定的抵制，但当时制作的卡片既不多，可用率也很小。另一方面，自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后，规定汉语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当时，《现代汉语词典》被“四人帮”禁锢了，要我们能拿出手的只有《新华字典》。《新华字典》质量好，使用价值高，但大国家，小字典，很不相称，这对于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治影响也是很不